

胡适 著
陈漱渝 姜异新 选编



胡适 著
陈漱渝 姜异新 选编

胡适论教育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论教育 / 胡适著；陈漱渝，姜异新选编．—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34-7132-3

I. ①胡… II. ①胡… ②陈… ③姜… III. ①胡适
(1891 ~ 1962) — 教育思想 — 文集 IV. ① G40 — 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696 号

Hushi Lun Jiaoyu

胡适论教育

胡适 著 陈漱渝 姜异新 选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36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132-3

定价 8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

“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

陈漱渝

我从未研究过教育问题，仅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当过十四年语文教师；但近三十年来到不少大学开过讲座，接受过特聘教授证书，特别是目睹了孙女从上幼儿园到考大学的全过程，因此对于当今的教育状况多少也会有一些实感。

我是南开大学1962届毕业生。在我就读的五年间，全校学生只有三四人；毗邻的天津大学当时是国内规模仅次于清华的工科大学，但学生也只有七八千人。如今大学规模之大、学生之多、占地之广，已令人瞠目结舌；外地重点中学的学生人数有些就已接近于当年的天津大学。至于究竟出了多少大师，多少成果，在国际上如何排位，当然又见仁见智。这使我在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而深受鼓舞的同时，又难免禁不住产生杞人之忧。

有人说，中国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度不如古巴，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度不如朝鲜。我没有考察过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言权。但我目睹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导致学生学业“如牛负重”的事实；目睹了应试教育受到非理性推崇的事实；目睹了教育追求实利而忽视心灵培养、素质提升的事实；目睹了创新型人才短缺、优质生源外流的事实；目睹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僵化、弊端丛生的事实；目睹了学生“高分低能”、学术论文注水、研究生水平滑坡的事实；目睹了家长跟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恶性竞争的事实。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直至毕业谋职，家长究竟

要操多少心，花多少钱，托多少人，甚至搞多少歪门邪道，恐怕谁也说不大清楚。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导致了下一代的教育分化，而教育的分化又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总而言之，无论对中国当代教育如何评估，教育出现了弊病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不适应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吃五谷生百病”。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愿睁眼看现实。教育有了痼疾如何疗治？恐怕没有一位“大夫”能开出一剂万应灵丹。我以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是“大夫”，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都能或多或少找到疗治当今教育弊病的药方。这也就是胡适在《非留学篇》中的主张：“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胡适的教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药方，其中有的药材可能使用不当，有的可能陈旧过时，但其中也肯定会有不少极有裨益，值得重新评估、予以重视的精华。

胡适是一位公认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至今仍然研究得并不充分的教育家。比如在作为教材的《中国教育史》¹一书中，专节介绍了杨贤江、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陈鹤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却讳言胡适。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胡适是一位领军人物。他接受过全面的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1895年至1903年在故乡安徽读过九年私塾；1904年至1909年在上海先后进过四所新式学堂；1910年至1917年又在美国度过了七年的留学生涯，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修过农科和文科，一生获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留学归国后，胡适又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执教，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他71年的生涯中，在大学总共工作了三十多年。

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体制改革方面，胡适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由于他的倡议，北京大学成立了评议会，创办了《北京大学日刊》，并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与分系法，陆续成立了各科各门的研究所。他主张“接受教育权利平等”，大力呼吁“大学开女禁”，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促使北大于1920年春开始招收女旁听生，同年暑假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大学男女

1 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同校的先河。1921年9月，胡适又向北京大学提交了预科改良方案，并按此方案开设了“试验班”，在“试验”中求改革。

胡适是一位法治的提倡者，推动教育立法是胡适终生不懈的奋斗目标。早在1922年他就参与了《壬戌学制》的制订。辛亥革命后废除了清末学制，仓促制定了《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学制》，一方面并未摆脱清末学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式学校又五花八门。1922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年会，讨论修订新学制，于同年11月1日通过，名为《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身为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是新学制的主要起草人，他的主张——学制改革的重心定位于中等教育——为学制所采纳，具体表现为小学七年压缩为六年，中学由四年延长为六年，分初、高两级，沿袭至今。1946年12月他领衔提交了《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议案，并亲拟了十项具体条文。1947年8月，在政局混乱、物价腾飞的形势下胡适又提出了一个《十年教育计划》，发展本土教育，扶植重点大学。由于胡适既有教育理论素养，又有教育实践经验，所以他的教育观内容丰富，涉及到教育史、教育法、教育理论诸多方面，极具特色。

胡适自认为他的思想受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这两个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思想，关注当前问题，把一切学说理论都视为有待证明的假设。不过，比较起来，对胡适一生的文化生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有趣的是，胡适对杜威的兴趣并不是来自对杜威的热捧，而是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客观唯心派”哲学教授对杜威学说的猛烈批判。“多谈科学而少谈宗教”的信条，使胡适在杜威哲学中找到了最初的思想契合点，于是他决定中断康奈尔大学的学业，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胡适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杜威的思想：一，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二，杜威论思想；三，杜威的教育哲学。¹

根据胡适的理解，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就是“经验”，所以杜威又将自

1 《实验主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己的实用主义称之为经验自然主义，亦即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在杜威看来，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一切圣贤的至理名言，都不过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工具，思想也不过是应付环境的工具。杜威特别重视教育，他强调“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而哲学力求解决的也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杜威反对教育与社会脱离，生活与教育脱节。在他看来，“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要“从做中学”。学生学习的对象不仅是任课教师，而且包括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包括整个社会。他的教育思想重实践，重经验，重适应环境，重视“智能的个性”的培养，猛烈冲击了“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对于笔者而言，要对杜威的学说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是一种学力不逮的事情。但笔者了解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杜威的著作至少被译成了三十五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仅《学校与社会》一书就译成了十二种欧洲和东方文字。在二十世纪初期，杜威正处于学术巅峰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杜威的学术影响有减退趋势。然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杜威的学说又重新得到了学术界的理解和充分的肯定。特别是杜威的教育思想，更是现代西方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成为了西方世界教育与政治理想的基本纲领。

由于胡适等人的推介，杜威学说也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18年至1919年，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休假年，利用这一时间，他于1919年2月初偕夫人到日本旅游并讲学。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学生陶行知获得了这一信息，便与其他一些留美学生——主要是胡适、郭秉文等联络，争取到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资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续假，促成了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认为这一经历是他学术生涯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之一。在中国，杜威一共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行程达十三个省。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五四爱国运动等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1919年5月13日，他跟孙中山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共同谋划改造中国人民生活的问题。1920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代理校长蔡元培在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时称颂他为“第

二位孔子”。这年夏秋之际，他还在北京碰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双方经常友好地辩论学术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一次哲学的巨大沸腾。青年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销售过《杜威的五大讲演》。毛泽东在湖南创办“问题研究会”，并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提倡“无血革命”，这些都明显反映出杜威思想的影响。1922年《壬戌学制》第四条明确写道：“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在组织学制时，应特别注意儿童的个性和资质。”这就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法规中的明确体现。陶行知在他创办的众多实验学校中更践行了杜威的教育理念。他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尊重儿童个性和创造精神，明确提出了“教学做三合一”的原理，为我国教育理论的民族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虽然杜威1928年访问苏联时曾“感到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但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提倡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他把暴力革命视为“过激主义”，认为现行制度应该“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一步一步朝前去”，只能“补救”“修正”，因为“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是杂凑的，不是整包的”。¹他的学说原本就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更缺乏生长的丰沃土壤。杜威强调“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把“真理”直接等同于“有用”，“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则又否定了真理的稳定性。他的教育思想也有重经验而轻理论，重点滴而轻系统等局限。所以，在对杜威学说的合理成份进行肯定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又需要进行应有的分析批判。

不过，胡适的教育思想绝非杜威思想的简单翻版。在杜威访华之前，中国思想界就介绍过亚当·斯密、尼采、穆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述。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对胡适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胡洪骅”之所以在19岁那年正式使用“胡适”这一名字，就是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广采博览、中西俱粹的思想家，胡适对杜威哲学的师承是有所选择的；他尤其擅于在中国古代典籍里直接寻找符合实用主义教育思

1 《杜威博士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2号，第8卷第1号。

想的元素。比如，他认为，在公共教育的观念上，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跟杜威“平民教育”乃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中国除官学之外，汉代的私人讲学也是当今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起源。胡适认为私立学校比较自由，更少限制，是传播学术的重要基础。又如，他肯定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打破了阶级观念，只问成绩，不问来历，成为了一种标准客观、公开竞争的选拔人才制度。这种制度经外国传教士推广介绍，对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清儒的治学方法中，胡适也找到了实用主义提倡的“实证”精神。这些都表明胡适力图用杜威的“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生活教育”“重视证据”等观点激活中国本土的教育传统，也表明胡适的教育思想不仅融入了杜威思想等西学理论，而且力图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特点与现实状况相结合。蔡元培赞扬胡适“新学深沉”，“旧学邃密”，这一评价在胡适的教育思想中也得到了印证。

要对胡适的教育思想进行明晰而准确的概括，于我也是一件学力不逮的事情。不过，我浏览过一些胡适谈教育的文章，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早在求学时代，胡适就将教育问题与实现“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胡适的“梦”就是再造“神州新文明之梦”。这跟当今全党全民为之奋斗的“中国梦”虽有严格区分，不能混为一谈，但在爱国救亡、振兴中华这一目标上又有内在的联系。1914年1月，23岁的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第三本上发表了一篇万言长文《非留学篇》，阐明了教育是“立国之本”，“实为一国命脉所关”的道理。当时清政府每年派两百名留学生出国深造，约需美金十九万二千元，折合银元四十余万。以此数额，可在国内兴办两所大学，培育两千名学生。胡适认为，在特定意义上，留学是中国的一大耻辱，因为自唐代以来，很多邻邦都争遣子弟到中国求学于太学，中华经籍成为了外国人的经典，一时洛阳纸贵。这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处于全盛时期，中国为“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沧海桑田，中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如败叶之遇疾风。神州俊秀，不得不纷纷渡海，西达欧洲，东游新陆，下至东瀛三岛，这难道不是中国之耻吗？胡适进一步指出，派员留学只是一种“过

渡之舟”，权宜之计；而“万世久远之图”是“振兴国内教育”，为神州造新文明，这样才能“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¹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都是映射该国历史传统与民族性格的一面镜子。发展教育，胡适最为看重的是增设大学；而他认为兴办大学又应落实研究能力的培养。胡适首先对“大学”这一名词进行了严格界定：“大学英名 University 源出拉丁 Universitas 译言全也，总也，合诸部而成大全也。”² 因此，仅有普通文科，或仅有一种专门学科的学校，只能称为专科学校，或学院，而不能视为大学。据胡适介绍，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如意大利的萨劳诺（Salerno）大学是一千年前创立的，美国大学的历史也比美国国家的历史悠长，而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机构却是萌芽于晚清的“新政”，不但时间短，而且教育史伴随着多灾多难的民族屈辱史。

胡适强调，真正的大学必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培养训练有素的科研人才。他极其重视建设研究型的大学，主张在大学中设立研究院，作为高等学府之中心。他认为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大学不能视为最高学府，只有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在他眼中，大学之“大”不在规模，而在于注重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的追求。1917年末，胡适率先引进了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建制，创办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并亲任主任。到1918年，研究生就多达140余人。

跟大学应重科研紧密相连的是，胡适认为大学应该倚重大师。因为教学过程固然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但决定课堂教学质量的毕竟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大学的根本在学术，而学术成果的取得依赖于人才，所以既要聘请大师培育人才，又希望人才中能有未来的大师脱颖而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为北京大学引进的大师级人才就有钱穆、闻一多、汤用彤、马叙伦、丁文江、吴大猷、饶毓泰等，为北京大学中兴奠定了师资基础。这些大师培养的人才中，有些就成为了今天学术界的大师。

1 参阅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49页至377页。

2 参阅书籍同上。

胡适主张分别类型层次，建立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类型可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官立或私立的专科学校。在这四类大学中，胡适认为应集中力量在中国创建一流大学，如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康桥（今译剑桥），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如能达到这一目标，胡适感到“吾死瞑目矣”。在胡适那个时代，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强调的是从西方引进现代教育模式，大胆吸引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而对如何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办出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则思考得不够充分。事实上，国外的教育也并非尽善尽美。2014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柯尔斯滕·奥尔森的专著《学校会伤人》，书中通过被访问者的回忆，触及了学校带给学生的痛苦、失望甚至愤世嫉俗的阴影，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旧伤痕：“创造力之伤”，“顺从之伤”，“反叛之伤”，“麻木之伤”，“完美主义之伤”，“平庸之伤”……书中还引用了美国教育学者约翰·霍特的名言：“学校，是让人变笨的地方。”又援引了一位家长巴伦的话：“学校这个地方，几乎不能寄托希望于在里面学到任何重要的东西，这个体系容不下他的长处。这不是教育。”如何遵循教授规律，在中国大地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¹在胡适看来，“树人”重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和主动研究精神。他认为中国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有一种独创的传统，那就是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这种“自动的研究”精神，就是人才成长强大的内在动力。胡适本人的成长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兄长原来希望他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认为既可振兴实业也可复兴家业，但胡适对工科不感兴趣，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期望到美国选读了农科，想走“以农报国”之路；学了两年之后觉得学农不适合自己的个性，又改学自己感兴趣的文科，致力于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的研究。所以在社会需求和个人兴趣面前，胡适认为选科和择业都要从个人兴趣和特长出发，这样才能获得“自动的研究”的主动性。

1 胡适 1916年1月25日日记。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创新型人才，胡适在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有很多设想。学制方面，胡适主张实行“弹性主义”的学制——即在现行学制的框架之内，给学生以升级与转学的自由，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限制和埋没。胡适在梅溪学堂和澄衷学校就读时就跳过班，在上海读书的五年间先后换过四所学校，因此没有受压抑的感觉。

打通文科与理科的森严壁垒，让文科学生多懂一些科学，让理科学生多了解一些世界思潮和人生问题，在胡适看来也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举措。因此，他赞同蔡元培在学制改革方面“文理两科合并”的主张。今天看来这种主张在大学虽缺乏普遍可行性，但精神实质还是可取的。因为未来一些前沿科学的新成果，很有可能在文理学科的交叉地带产生。

为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还建议大学开设选修科。他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上选修课等于探险，可以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胡适举例说，伽利略的父亲要他学医，有些朋友又劝他学美术，但他都不感兴趣。有一次在补习班偷听了几何学课程，大有兴趣，结果学了数学，成为了新天文学和新物理学的奠基人。

为了培养训练有素的科研人才，胡适特别看重培养学生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态度，引导他们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据说，他这方面的论著总数在百万字以上。他还对友人说：“‘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¹。

胡适科学方法的精义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所谓“大胆”就是要敢于言前人未言，“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就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两三个假设中的一个。大胆的假设的前提是知识的充分积累和思维能力的不断拓深。一个假设就是一个假设的解决方法。假设选定之后就需“证实”或“否认”。所谓“求证”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小心的求证”，贵在齐全、充分、适用的证据。材料可以帮助方法，也可以支撑论据。材料不同，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自然不同。

1 《胡适口述自传》，第105页，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光“假设”不“求证”，就会流弊无穷。所以应该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挖掘新材料，寻求新突破。这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箴言的精髓。

胡适提倡的治学态度就是看问题、做学问都能持一种批判和客观的态度，不易陷入“‘偏见、武断和盲目’接受传统与权威的陷阱”¹ 胡适的这种观念固然跟西方哲学中的“怀疑主义”有关，但也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比如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就说过：“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了胡适的治学格言。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胡适还十分注重教师的教授法。他认为，不改变教学方法，教育就不会有长足的进步。他提倡的教学方法是注重自修，注重讨论，培养学生比较和批评的能力。在语文教学方面，胡适反对那种逐篇逐句的注入式讲解，而主张教师质疑问难。他还认为语文教学应提高学生讲演、辩论的水平，使教学方法更加灵活。他断言：长于演说的人，一定能写出好文章，辩论家也是一样。在外语教学方面，胡适提供了一个经验，叫“专修”，即规定一个期限（如半年），营造一种浓郁的外语氛围，集中突出一门外语，使学生能听、能讲，直到能读能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之间培养翻译人才的举措，在和平时期仍然可以借鉴。

胡适的教育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教人如何读书。北宋欧阳修有一句名言：“立身以学习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阅读史。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在学生的阅读水平。

为什么要读书？胡适认为，读书不是买时髦衣服，可以炫耀于人，而是买眼镜，使自己的眼光明晰远大，小的可以放大，模糊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成近的，所以读书不能畏难。“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因为这类书更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增长才智。胡适有一个读书的诀窍，就是求知要带问题。他精辟地指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没有问题

1 《知识的准备》，见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而解决问题有五个步骤：一、产生疑问；二、明确难点；三、如何解决；四、解决方法；五、予以证实。

胡适在读书过程中，能够辩证处理“精”与“博”的关系。要“精”，就必须“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指识字，“口到”指诵读，“心到”指领会含意，“手到”是写出的心得。“博”就是“开卷有益”。宋人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中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意思是，光读经书并不足以读懂经书。王安石注重读《难经》、《素问》、《本草》等子部书籍，又放下架子向农夫女工请教，对他领悟经书帮助极大。这也说明了读书可以帮助读书。

胡适的这种用读书帮助读书的方法也叫“致知后读法”，是一种力求“沟通文理”的现代通识教育法，其依据就是知识的触类旁通。理科与文科虽然学有专攻，两者之间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胡适举例说，直到清朝还有许多学者读不懂《墨子》一书，但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知识普及之后，《墨子》中的很多知识就能读懂了。所以读别种书愈多，对某种书籍的理解就愈深。只有博览群书，才可精读一书；“以读攻读”，这就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在读书过程中，胡适总结出一个“四字诀”。古人有一个做官的经验，叫“勤谨和缓”。胡适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做人、做学问。做学问的“勤”就是不偷懒，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尤须善于利用闲暇时间。如果每天花一小时读十页书，那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这样就可以为成为学者打下基础。佛教典籍中有一句话，叫“功不唐捐”，意思是追求学问付出的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和”就是心态平和，态度虚心，不要武断，不持成见。“缓”就是适当放慢节奏，不要輕易下结论。胡适举例说，有一种专治花柳的药，叫“606”，就是经过606次试验才最后获得成功。胡适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读书心得，无疑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笔者在粗读胡适有关教育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有些观点对

于当今教育现状仍有针砭意义。比如胡适反对教育的“营业化”。他指出，办学如果单纯以赢利为目的，扩招学生越多，野鸡学校越多，粗制滥造的毕业生越多，教育的信誉也就越来越低落。而要杜绝这一弊端，他认为关键是在迅速普及义务教育，推广助学金和免费读书的制度，使学生在求学期间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技能。在《学生与社会》一文中，胡适提出了一种“完全教育”的主张，即“量”与“质”并重，普及与提高并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文科与理科并重，课内与课外并重，“有用”与“有趣”并重，“精”与“博”并重，手段与目的并重。这里讲的“并重”，不能理解为“半斤”对“八两”，而应理解为不可偏废。这种主张对于矫正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的盲目扩招无疑是有警诫意义的。

胡适针砭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弊端时，曾提到制造和使用假文凭现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有专门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构，价高时每张可卖80元，滥印时平均也可卖到18元。胡适指出，要杜绝这种现象，应对的办法就是允许同等学力学生投考相应学校，而不拘泥于文凭。我们痛心地看着，时至今日，单纯以文凭录用人才和制造假文凭的现象仍未彻底杜绝；即使是正规学校颁发的真文凭，知识含量也有缩水的趋势。这跟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学校无节制扩招，导致学生“严进宽出”或“宽进宽出”密不可分。

胡适教育思想中还有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观点，就是提倡职业教育。胡适指出，1922年曾在济南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讨论改革教育制度，曾呼吁重视职业教育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办职校需跟工厂或其他机构（如医院、旅游、餐饮等）配套，受到一定限制，致使职业教育不发达，国家缺乏技能型人才。近日，国家教育部门明确了高等教育院校改革方向：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比例达到50%，说明当前高校培养的普通脑力劳动者已超过了经济的吸纳能力，造成供应过剩，而经济机构转型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这也证明了胡适某些教育主张的前瞻性。

无疑，胡适的教育观的确存在历史局限性。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批

判胡适思想的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的倾向。比如长期以来，胡适对于学生运动的意见一直遭到诟病，因为胡适跟杜威一样主张渐进式的点滴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所以当学生运动成为革命党的第二条战线时，提出“学术救国”“人格救国”的主张，劝学生“安心读书”、“把自己铸造成可用之才”的观点就显得是逆潮流而动，客观上成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消防队和灭火器。不过，胡适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学生运动。如果这种运动能调动学生的自动精神，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关注，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他认为那就是一种好事，如五四运动。但胡适反对学生动辄以“罢课”作为武器。因为罢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情，于旁人无损，于自己无益，还有可能造成逃学恶习。细读《论学潮》、《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等文，感到应该充分看到胡适思想的复杂性，不能作简单的价值判断。

首先，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思想并非专门针对共产党。胡适提议，“学校对于一切政治派别，应该有同一的公道待遇，不应该特许某一党派公然挂招牌设区分部，而不许别的党派作政治活动”，其矛头显然是针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公然在学校挂招牌设区分部，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只能处于秘密状况，随时可能遭到迫害。其次胡适认为应该看到学潮产生的社会原因：“一，经费不足，又不按期拨付，故学校不能安定。二，校长与教职员不够领导学生的资格，故学校风纪不能整顿。三，国家政治不能让人满意，故青年倾向政治活动。四，国家用人不由考试，故青年不看重学生成绩。”（《论学潮》）所以要杜绝学潮，就必须根除社会弊端。正如胡适所说：“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我们过去讲学生运动天然合理，或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也都是肯定进步学生运动对腐败政治有弹劾作用。第三，胡适认为学生运动应保持高度理性，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这种看法在革命政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可能会捆绑群众手脚，因为当时法律不可能给颠覆现政权的革命活动以保障，但在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应该肯定其合理的内核。同一主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

这恐怕不应该简单地斥之为“双重标准”。

在行将结束文本时，需要再回到胡适再造“神州新文明之梦”这一话题。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而教育事业正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所以，教育工程是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从全球视野创建人才强国的支柱和基石。历史的中国是现实的中国的借鉴，所以我们编选了《胡适论教育》一书，希望能够用教育推动人才强国梦的实现。

本书编选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全1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全集》（全44卷）。附录整理有《胡适教育年谱》，参校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适年谱》、耿云志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胡适年谱》及胡适日记，主要涉及胡适工作后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活动，其幼年及青少年时代所受教育部分略去。谱文中的引文皆出自胡适日记。

因编者学识有限，本书不足之处定然多多，希望博识之士不吝指教。是为序。说是“序”，其实不过是一些读书札记和零星感悟而已。

2014年父亲节草毕